

电影《满江红》的家国叙事与文化传承

■文/齐莉莉

经历了三年沉寂,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终于迎来了全面复苏,而作为全年电影市场最重要的阵地之一,2023年春节档的整体表现无疑成为中国电影“恢复状态”的重要风向标。回望2023年春节档,以《流浪地球2》《满江红》《无名》《深海》为代表的电影群以高关注度、高讨论度、高票房、高口碑的整体表现,为疲软多日的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其中,由张艺谋导演执导,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王佳怡主演的《满江红》无疑是春节档电影的“第一梯队”。

该片以南宋绍兴年间爱国将领岳飞受冤而死,奸臣秦桧手握大权的南宋为历史背景,讲述了随着金国使者意外被刺杀,秦桧通敌的阴谋神秘消失的密信呼之欲出,影片叙事充满悬疑意味,层层反转。形成以寻信立功为引,暗杀秦桧为线,最终达成岳飞昭雪,重现遭作《满江红》的内部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小兵张大、亲兵营副统领孙均、宰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淳、舞姬瑶琴、更夫丁三旺、马夫刘喜等人卷入其中,一场小人物剑指权贵,实现家国大义的壮举铺陈展开。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达45亿余元,位列内地影史票房榜第七位。谈及影片的成功,张艺谋式的色彩、光影、镜头、配乐等高质量“硬件”固然重要,但深究之下不难发现,影片所蕴含的家国叙事与文化传承才是影片的靈魂所在。从题材到故事,从情节到人物,影片从小人物切入,形成“人一家一国”的递进式叙事逻辑,通过电影故事的推进和电影的传播,《满江红》所承载的家国文化实现了银幕内外的双重传承。

一、家国符号,岳飞与《满江红》的核心内蕴

回望宋金战争,始于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至南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方以“蔡州之战”宣告结束。这场历经一百余年,跨越宋代南北时期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宋金常年交战为南宋社会带来的损伤,也是南宋最终覆灭于蒙古的深层原因之一。宋金之战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中原外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入侵”战争。从交战双方来看,宋朝所统治的“中原”与金国所立足的北方地区相比,拥有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更为悠久的历史根源,更为深厚的政治基础,以及更多的人口,所以拥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国家意识”。这也使得在当时的语境下,宋金战争被“正史”记录为一场“正统王朝”和“外部入侵民族”之间的战争,其时,“爱国”尚为突破“忠君爱国”的历史局限,从宋朝军民的视角来看,“尊王攘夷”正是宋金战争的注脚,岳飞正是在宋金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爱国将领,他和他的岳家军英勇奋战,在宋朝抗金的战争史上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与赫赫战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岳飞受南宋统治者连下“十二道金牌”班师撤兵,被侄臣秦桧构陷,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命丧风波亭的悲剧结局。英雄的悲剧口口相传,岳飞抗金的故事也在千百年的传承中突破了原有的历史局限,岳飞,渐渐成为一个全民族的、承载爱国情怀的历史符号,他的一曲壮怀激烈《满江红》也成为传承爱国情感的千古绝唱。

历史上,岳飞死于公元1142年,电影的故事则发生于岳飞死后四年。彼时,奸臣秦桧依然权倾朝野,而一众岳家军也随着岳飞的死,背上了“谋反”的罪名,四散分离的同时,也成为秦桧及其党羽最忌惮的“势力”,长时间遭受迫害。小兵张大、更夫丁三旺、马夫刘喜,正是藏匿于秦桧身边的岳家军遗部。他们蛰伏多年,步步为营,最终抓住了一个机会,让岳飞的遗作《满江红》重新现世,以此为岳飞昭雪,唤起南宋军民抗金御敌的决心,传承岳飞的爱国精神。诚然,电影《满江红》的故事据历史而来,但如片头所说,故事本身纯属虚构。如果说张大、丁三旺、刘喜、瑶琴、孙均一行人的义举,是电影在历史记载的空白角落进行艺术填补,那对于《满江红》的“遗作设置”,就是与史实出入最大的艺术虚构。据历史考证,《满江红》的创作应在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到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之间,彼时的岳飞尚征战于宋金之战的前线,岳飞与其岳家军在宋得到统治者支持,得到人民拥护响应,对金战绩累累,具有强大的震慑力,纵观《满江红》全词,虽有“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悲愤痛惜,但“架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乐观主义战斗精神和收复失地的壮志宏愿却是全词的主旨,仅从这个层面上分析,《满江红》基本没有作为“岳飞遗作”的可能性。加之历史对岳飞死前“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的“供词”绝笔的明确记载,将《满江红》作为遗作的设置彻底还原成故事的虚构。那么,与史实出入如信呼之欲出,影片叙事充满悬疑意味,层层反转。形成以寻信立功为引,暗杀秦桧为线,最终达成岳飞昭雪,重现遭作《满江红》的内部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小兵张大、亲兵营副统领孙均、宰相府总管何立、副总管武义淳、舞姬瑶琴、更夫丁三旺、马夫刘喜等人卷入其中,一场小人物剑指权贵,实现家国大义的壮举铺陈展开。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达45亿余元,位列内地影史票房榜第七位。谈及影片的成功,张艺谋式的色彩、光影、镜头、配乐等高质量“硬件”固然重要,但深究之下不难发现,影片所蕴含的家国叙事与文化传承才是影片的靈魂所在。从题材到故事,从情节到人物,影片从小人物切入,形成“人一家一国”的递进式叙事逻辑,通过电影故事的推进和电影的传播,《满江红》所承载的家国文化实现了银幕内外的双重传承。

《对联》杂志征订信息

《对联》杂志(原名《对联·民间对联故事》)创刊于1985年1月,由山西日报社主管。以教育普及、传承发展、学术研究为核心,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对联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

首先,是从个体到群体的置换。在大众的认知中,要讲《满江红》的故事,必须讲岳飞,而在电影的故事中的前半段,可以说故事主角也从岳飞这个个体英雄置换成了“岳家军”这个岳飞精神的承载集体,历史真实中刻在岳飞身上的“精忠报国”,在电影中是整个岳家军的“图腾”;之后又通过张大、丁三旺、刘喜,进一步扩散到瑶琴、孙均,电影的主角最终成了传承岳飞遗志的人物群。个人英雄主义也变成了人民的集体的爱国主义。其次,是将小人物还原成英雄。影片最开始,对张大的角色定位如他的名字一样,随意普通,不过是一名插科打诨“贪生怕死”的底层士兵。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他有勇有谋,是整个复杂计划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关键执行者,之前的人物印象不过是他的伪装;更夫丁三旺,他打更的时间不对,露了马脚被逮捕,一句“我想吃点好的,想再常常穿相吃这的东西”,看似描写其底层人民饥饿贪吃的特征,实则是为下一步计划的推进布局,更是在最后主动赴死,进一步将孙均卷入其中;刘喜看似一个沉默寡言的厨房车夫,却隐忍多时,最终只身犯险,刺杀秦桧的管家何立,最终在何立的阴谋下死于同胞张大之手;瑶琴身为歌女,初登场时尽显风尘女子的八面玲珑、胆小畏权,实际上也是心怀家国,主动参与到计划之中的义士之一,她有谋略,有手段,会金文,与何立同归于尽的一场反转绝杀,更是成为影片的经典场面之一,身处仇家恨中瑶琴沦落风尘,却不是世人口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存在。张大、丁三旺、刘喜、瑶琴的共同点在于,都处于社会底层,甚至社会边缘;都心怀家国,有勇有谋,所以他们联结在一起,集合小人物的力量去完成一个犹如“蚍蜉撼大树”般看似不自量力的任务。可以说,这些角色从小人物到英雄的转变,一方面是通过角色初始形象和真实人物的反差达成的,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小人物的个体力量 and 家国情怀的对比实现的。最后,就是英雄还原成普通人。电影通过对人物的亲情、友情、爱情的全面情感侧写,将这些将生离死别的亲情关系,真正做到一个普通人。电影中,孙均与张大在秦桧大宅里是上下级关系,除此之外,还是一对年龄倒置的舅侄,这对亲情关系在电影的描述得有些许“淡薄”,却将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正是有了这种从小到大的亲情关系,张大才能洞悉孙均明哲保身下真挚的爱国心,将最终的任务托付于他。除此之外,影片中另一处亲情侧写便是刘喜和他的女儿桃丫头,因为背负着仇恨和任务,刘喜始终没有和桃丫头相认,而是以一个“叔叔”的身份守护在桃丫头的身边,将女儿和家传玉镯托付给张大后,便孤身前去刺杀,一个义士深处危险之中,家国不能两全的无奈令人动容。电影《满江红》中笔墨最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情线当属的爱情。一个是岳家军的无名小兵,一个是来自关外的风尘女子,在乱世之中相互救赎、相互依靠,张大为了瑶琴的安全将她置身事外,而瑶琴却主动参与进来,张大在危机四伏的局中局中送给瑶琴一颗她不曾见过的樱桃,瑶琴在刺杀秦桧之前才将樱桃吃下;瑶琴会在无人之处为张大唱一曲《舟过吴江》,张大只能在瑶琴临阵前以曲调回应她的真情……英雄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悲欢离合。

二、人民叙事,小人物故事与历史英雄的双线聚合

如前文所述,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志士,岳飞的爱国情怀在千百年的传承中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内涵,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岳飞及其《满江红》不仅仅是一个朝代的精神旗帜,更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电影《满江红》就是带领观众回到岳飞舍冤而死的时代,回到在当权者“赶尽杀绝”的语境里,为岳飞精神的传承构建了一个更为浪漫和悲壮的故事。我们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中,岳飞平反昭雪之路颇为艰辛漫长,直至宋孝宗继位才得以彻底平反,并得到追封。而这是站在当权者角度的“官方平反”,在大宋军民的心中,对岳飞精神的认同和传承从未中断。在电影中,对岳飞精神的传承可以分为四个维度。其一就是从岳飞到岳家军的传承;岳飞虽然身死,岳家军虽然在解体,但岳飞的精神却在岳家军内部得以承袭,这些以“岳家军”为精神归属的个体们——张大、丁三旺、刘喜,他们还会因岳飞精神而重聚,并为了传承岳飞的精神,为了捍卫心中的真理,蛰伏以待,以命相搏。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张大、丁三旺、刘喜的名字是为了凸显其人物的普遍性,那瑶琴就是更为特别的存在,她的名字出自岳飞的词《小重山》,“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瑶琴”其人则在电影的故事里,就是承知晓岳飞的在朝堂之上难觅知音的心事的人之一。其二,是从张大一行人集体内部向外部孙均的传承。不同于张大、丁三旺和刘喜,孙均不是岳家军的遗部,不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但他却成为整个计划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除了张大的步步谋划之外,更重要的是孙均的个人成长。在被卷入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孙均从一个在秦桧手下生存,明哲保身的普通军官一步步接受岳家军爱国精神的浸染,他埋藏于心中的家国大义最终被唤醒,选择延续死去的张大、丁三旺、刘喜、瑶琴的行动。至此,岳飞的精神从岳家军张大为中心的集体内部,完成了向外部的传播。而我们可以想象,千千万万的普通军民,甚至张大、丁三旺、瑶琴本身,也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向孙均一样,在沉沦中被感化而最终觉醒。其三,当最终目的达成,孙均逼迫假秦桧在全军面前背诵出《满江红》,岳飞的精神也随《满江红》的“全军复诵”一起,从整体上完成了从“被封杀”到“被传承”的转变,在全军复诵的戏剧高潮中,岳飞及其精神的传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从小集体到大众的传承链条。最后,影片还将这种精神的传承指向未来,指向代代相传——影片的末尾,刘喜的女儿桃丫头作为懂懂的孩童一边玩着大门口的石狮子,一边喃喃自语:“全军复诵——全军复诵——满江红——怒发冲冠——”而列队而立的军队,便随着这个孩童背诵起《满江红》来。这其中暗含的,就是岳飞精神和爱国情怀的代代传承。

作为文化产品,电影承担着思想文化传播的功能,岳飞精神的传承自然也不会仅停留在电影的内部,而是随着电影的放映,在和观众的情感互动中,被观众所接受、理解、内化为集体精神的一部分。电影的叙事空间虽然停留在古代,但岳飞精神的传承意义却是指向当代的——如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的崛起的同时,西方国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正在以更隐蔽、更新颖的方式进行。而当代的年轻人们,正首当其冲收到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面临着如孙均一般价值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满江红》的故事以古喻今,唤起大众的家国情怀的同时,更是旨在通过电影传承文化,加固大众心中的文化自信,以抵御当代新的“外部入侵”。据统计,仅在上映期间,《满江红》的累计观影人数就突破了8000万,电影作为当代最大众化、最具影响力的文娱方式,将承载着家国情怀、传统文化,在当代完成一场精神文明的复诵。

三、传承价值,银幕内外的双重意义

回望电影《满江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在类型融合上取得突破的主旋律电影,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悬疑故事、喜剧风格,但最终,超越电影形式而打动观众的,还是电影中的人物、情感,是电影所传承的文化和精神。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2022年校级教研课题:新媒体传播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思政教学创新实践研究;2020年第一批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自媒体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思政教学产学研结合模式研究(编号:220603221294311)的研究成果

教育题材影视剧对我国教育管理模式变化的呈现

■文/张鸽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现实主义题材热的回归,“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国民大众最为关切和重视的焦点问题。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化艺术领域的直观映射,教育题材影视剧通常以少男女、校园学习生活和家庭关系为表现对象,关注青少年身心成长发展和当下教育领域社会关注热点,反映国家普遍面临的“教育焦虑”,具有重要的社会引导教化价值。近年来,我国教育题材影视剧的发展正随着时代进步以及国家的教育政策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蓬勃发展趋势,也在从各种不同维度呈现着我国教育管理模式的变化特征。

一、萌芽时期的大胆探索

萌芽时期的教育题材影视剧主要以九十年代以前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师魂》《绿茵》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教育类影视剧主要以教师群体作为叙事主线,也突出反映了我国早期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显著问题。一方面,作品叙事偏向教师群体视角而相对忽略学生形象塑造,表现了当时我国教育管理理念和实践多以教师为中心而未意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影视作品中教师在教育问题上习惯于从自身思想观念和经验出发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而忽视了学生个体心理情感需求,错误地将学生作为教学的客体而非主体。由此可见当时整个教育管理模式都缺乏对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尊重和个性发展需求的重视。另一方面,对教育管理体制的反思和呈现是萌芽时期教育题材影视剧做出大胆探索。这一时期的教育题材影视剧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已经开始反思填鸭式教学方式、特殊教育体制的不完善、教师职业保障发展机制不健全、排斥新式开放教育管理等理念等问题。由此也说明,科学有效的教育管理模式必须符合时代要求和学生发展需要,随时反思教学思维的有效性创新性,同时也要关注义务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种教育形式系统之间的协调统一。

二、发展阶段的实践反思

九十年代以后至本世纪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和思想文化进步的同时也促使教育题材影视剧内容风格越发丰富开放,诞生了《十七岁不哭》《十八岁的天空》等以青春校园主题为代表的影视作品,突出反映和体现了我国这一时期教育管理模式和思维上发生的显著变化。一方面,教育题材影视作品将叙事重心从教师群体转移到学生群体。这一时期的教育题材影视作品更多是围绕青少年的思想心理和情感生活展开叙事,比如早恋问题和青春叛逆心理问题的处理,当时的教育者已经意识到了口头说教式和强硬惩罚式等传统教育管理模式的弊端,尝试以平等平和的姿态度方式对学生心理进行道德教育和科学引导,所取得的教育效果也立竿见影,符合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要求。这就说明教育管理的思维手段必须以尊重学生心理情感特征和需求为前提。另一方面,《家有儿女》这类家庭教育主题影视作品成功表明当时教育界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到了家庭教育问题上,看到了家庭教育对于学生终身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这也成为之后我国教育类影视剧在类型内容上开始转向家庭题材的重要信号。由此可见,教育管理模式应当不断开拓思维开阔眼界开放格局,积极吸收新思想尝试新手段,关注素质教育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发挥好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教育合力,正确处理师生关系营造和谐教育管理氛围。

三、新时代的全面呈现

近十年来的教育题材影视剧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主题内容形式都愈发多元。一方面,当下教育题材电视剧更关注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对整个社会教育管理体制模式的影响力。比如关注小学教育的《虎妈猫爸》、关注中高考的《小别离》《小欢喜》等都引起广泛社会关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家长教育焦虑、唯分数主义、补课兴趣班等教育内卷问题、抢占学区房教育资源等都是目前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的缓解在当下依然步履维艰,只能一步步从思维转变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入手,为广大学子提供多元教育成长路径和公平教育条件保障,在精神层面和发展需求的重视。另一方面,对教育管理体制的反思和呈现是萌芽时期教育题材影视剧做出大胆探索。这一时期的教育题材影视剧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已经开始反思填鸭式教学方式、特殊教育体制的不完善、教师职业保障发展机制不健全、排斥新式开放教育管理等理念等问题。由此也说明,科学有效的教育管理模式必须符合时代要求和学生发展需要,随时反思教学思维的有效性创新性,同时也要关注义务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种教育形式系统之间的协调统一。

广告

国内统一刊号:CN14-1389/I

国内邮发代号:22-88

定价:月刊,120元/年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均可

十本以上集体订阅,直接联系《对联》期刊社

征订热线:15735155820 13269221236